

人类学论丛

〔美〕顾定国 著
胡鸿保 周燕 译

人类学论丛 □ 人类学论丛
人类学论丛 □ 人类学论丛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中国人类学逸史

——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71 2779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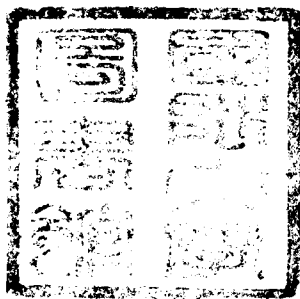
人类学论丛*

中国人类学逸史

——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

〔美〕顾定国 著

胡鸿保 周 燕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人类学论丛 ◆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中国人类学逸史

——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

〔美〕顾定国 著

胡鸿保 周燕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美]
顾定国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2
(人类学论丛)
ISBN 7-80149-381-8

I. 中… II. 顾… III. 社会人类学—理论研究—中国—
史料 IV. C912.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5408 号

·人类学论丛·

中国人类学逸史

——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

著 者：[美] 顾定国
译 者：胡鸿保 周 燕
责任编辑：罗 琳
责任校对：闫晓琦 同 文
责任印制：同 非

出版发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 5 号 电话 65139961 邮编 100732)

网址: <http://www.ssdph.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排 版：北京中文天地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春雷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1/32 开
印 张：12.375
字 数：270 千字
版 次：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5000

ISBN 7-80149-381-8/K·038 定价：2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Gregery Eliyn Guldin
THE SAGA OF ANTHROPOLOGY IN CHINA
From Malinowski to Moscow to Mao

Copyright © 1994 by M. E. Sharpe, Inc.
本书中文版已获美国 M. E. Sharpe 出版公司授权

G079.1/15



本书作者在梁钊韬 70 寿辰庆贺会上与梁教授握手



1935 年拉德克利夫 - 布朗访问燕京大学社会学系

第一排左起：赵承信、吴文藻、林耀华

第二排左起：严景耀、雷洁琼、布朗、杨懋春



厦大历史社会学会欢送 1936 年毕业生
第一排左起第三人为林惠祥
第二排左起第五人为梁钊韬



本书作者采访杨成志 (1987 年 11 月)

出版者的话

人类学者研究各个时代、各个地区的人类，通过自己的田野工作和理论思考，努力让社会明白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行为；人和人的行为为什么会不一样，又为什么会一样——人类学者对于“对立统一”有特殊而深刻的理解。体质人类学者把人类作为高级动物来研究，研究人类内部从古到今的各种生物学差异；社会文化人类学者研究人的生活方式，研究其中的社会结构和文化象征的意义和作用；考古学者从物质文化，尤其是古代的有形资料，解释人类行为；语言学者研究作为文化传承之载体的语言符号，由语言结构隐喻社会结构，以言语活动比附社会活动；民族学者观察文化、体验文化，听取本土人的观点。

人类学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从泰勒、摩尔根，到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从19世纪末的传教士，到20世纪的本土人类学者，人类学走过了一段风风雨雨的历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暴力的作用降低，第三世界兴起，逐渐走向开放，经济和文化全球化与多元化并存，和平和幸福成为人们的普遍要求；另一方面，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走在前面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组织、劳资关系、企业管理和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等等方面进行调节的同时，并没有解决

人的异化问题。面对频繁的局部战争、种族纠纷、经济危机、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人们束手无策。与此同时，一场反文化运动和社会批判运动兴起。在文学、艺术以及行为科学中，个人主题取代了社会主题，主观取代了客观。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学，人类学者一方面继续发挥实证的传统，另一方面更加注重本土人的认知体系，也更加注重学术乃至人格反思。

在中国，人类学经过 70 多年的（大致从蔡元培《说民族学》算起）风风雨雨，进入了承上启下的时期。中国已经走向世界，世界比过去更加开放，社会文化人类学也在信息社会和市场经济的推动下，发生或者正在发生一系列重要变化。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自 70 年代恢复和重建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者和民族学者继承发扬优良传统，注重研究传统文化，也注重研究与国家建设有关的现实问题，研究“全球化”带来的新现象。中国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和民族学，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得到一个从幼年到成年的自然生长过程，面对内部的需要和外来的影响，显得有些准备不足。虽然它们对国家的学术建设和知识建设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无论我们如何争论社会科学有无国界，争论是否需要借鉴西方人类学理论和方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本丛书的着眼点有三：翻译介绍人类学经典之作；翻译介绍与中国社会尤其与中国现实有关的重要著作；展示中国人类学者的理论思辨和田野工作的成果。编者希望对话的视角，综合的方式，介绍人类学的经典之作，展示近些年来国内外一些人类学理论和实践的新发展，为同行们提供参考，为社会管理者以及其他有关人士提供新的知

识。不过，我们不会拘泥于“平分秋色”式的全方位翻译和介绍，而是立足国内，根据国内本学科及相关学科发展的需要。当然，我们要声明，我们只是从自己的眼光看问题，不一定就是“客观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追求客观，努力做到符合逻辑，行之成理。

序

顾定国 (Gregory E. Guldin) 是美国太平洋路德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和人类学系教授、亚洲问题专家、应用人类学家。

顾定国教授早在 80 年代初就为太平洋路德大学与中国高等学校的学术交流进行积极的联系工作。他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有长期的交往, 1984 年底参加了在中山大学召开的人类学国际会议; 1986 年作为访问学者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任教; 1992 年以来几次与人类学系共同进行珠江三角洲等地都市化以及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等课题研究。他在广东几个县进行过田野调查, 参加并指导青年教师和学生进行调查工作。令人赞赏的是, 他会讲普通话和粤语, 调查时可以和农民通话。来自勤奋和决心的能力使他具备研究中国社会以及发展交流合作的良好条件。

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到顾定国对中国和研究中国人类学的热情和兴趣。他的夫人是中国人, 两位千金取名思华和思明。孩子受父母的熏陶, 遵守回到家里必须讲中国话的规定, 也学会讲流利的粤语。家里陈设着中国文物、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工艺美术品, 那个表情生动的东汉说唱俑使满室生辉, 这个体重几十斤的模型是他从中国抱着飞越太平洋的。我多次到他家作客, 参加犹太人节日的聚会和仪式, 和他讨论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之间的联姻, 在家庭生活中如何体现不同文化的交融等问题。

顾教授一向以热情、友好的态度关注中国建设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人类学的成长。他在大学的办公室里有不少中国书籍，引人注目的是长期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这在美国并不是寻常的现象。他对中国人类学所做的工作，一是把西方人类学介绍给中国同行，二是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中国人类学。

从80年代前期起，顾定国在广州、北京、昆明、厦门等地举行过多次讲座，介绍都市人类学、族群性、犹太人问题、西方人类学的动态等。在他的帮助下，1989年底在北京举行了中国首届都市人类学国际研讨会；会后他主编出版了《中国的都市人类学》和《都市化中的中国》，并开展了其后的一系列活动。

他向西方学术界介绍中国人类学，主编出版了《人类学在中国——对学科的界定》，反映了80年代前期的复苏的中国人类学。1994年出版的《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详细地叙述了中国人类学的发展过程，各地有关高等院校、研究机构和队伍的建立和发展，各个时期研究的主要内容和解决的问题，中国人类学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形势所走过的道路。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作者根据的资料“以对创造这一历史的中国人的采访、传记和学术论文以及笔者的观察为基础”（引言）。除了根据中国和西方的有关文字资料之外，作者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普遍访问了中国老一辈著名人类学家（他们中大多数人后来相继辞世），以及不同年龄层的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他笔下出现许多人物的经历和学术生活，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一些论文中见不到的具体资料，也包括一些有趣的轶事。个别的描述也许不够确切，但这些访问记录已成为研究中国人类学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作者把重点介绍当代中国人类学研究领域的任务，包括理

论倾向、方法论的标准、对相关人类学机构的评论、政治与学术的关系，以至中国人类学家的生平和生活方式等，留给他的关于中国人类学的第二本著作。

这本书以梁钊韬教授为主线，从梁先生的学术活动说起，联系到中国人类学的发展历程。他希望这样的写作方式会增加趣味性；同时，正如上面所说的，他和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有密切的交往，在这里搜集的资料更多一些。作者表示：“对梁钊韬的活动‘过多的叙述’并不是为了将他树立成什么偶像或是吹捧他个人的影响力或重要性，而是为了体现他作为一名积极的参加者的作用，并借此使叙述更加生动”（引言）。书中叙述了梁先生的强烈爱国心和献身新中国、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的敬业精神，梁先生强调人类学的民族性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将本质上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远见和分析力融汇到人类学与民族学中的必要性”（英文版，175页）。作者介绍了梁钊韬的学术思想，指出在有人类学传统的中山大学重建人类学是梁先生的毕生的计划，在80年代初梁先生为在南方重建人类学据理力争，他“是带着一个经过历史考验的人的自信着手他的重建计划的”（英文版，209页）。在梁钊韬教授逝世12年之后，回顾80、90年代中国人类学的重建和发展，我们更进一步认识老一辈人类学家们创建和发展中国人类学的丰功伟绩，同时，也深切感受到梁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复办人类学系的远见卓识。

顾定国博士强调美国模式的四个领域的人类学，它包括社会文化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因此，他除了重点介绍社会文化人类学（民族学）之外，用了相当多的篇幅叙述中国的考古学、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情况。但考虑到语言学、考古学在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被视作独立的学科，因而书中一再使用“人类学学科”

一词。梁先生一贯倡导并建立了四领域的人类学系，设民族学和考古学两个专业，包括体质人类学和语言学的教学，主张将四学科融汇贯通。按照人们最一般的理解，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体质形态和社会文化现象的学科，即使没有把考古学和语言学包括在四领域之内，这四个学科也是关系极为密切的姊妹学科。

顾教授及时地提出关于人类学本土化的问题，认为这是代表第三世界的一个有普遍性的问题，也是如何使人类学为社会变化和发展的需要服务的问题。吴文藻先生在30年代就提出了人类学中国化的问题，今天中国人类学界也正在积极探讨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人类学。书中列举了在辩论人类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各种见解。作者指出，“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发展所能作出的贡献，……显然是其探索人类学模式的独特经历”；从本土的实践中产生真正有意义的贡献；将人类学应用于国民生活，反映社会实际情况，引导变迁，服务人群。

读者还可以从书中了解到西方人类学家的一些观点（政治的、学术的），有一些报导可能与事实有些出入。不论是读者同意或是不同意的，都可以从中受到启发。

胡鸿保博士和周燕女士合作将这本书译成中文出版，使广大读者对中国人类学、民族学有更多的了解，是一件大好事。应胡博士之嘱，作短文为序。

黄淑婷

1999年12月于广州中山大学

作者中文版前言

无疑，21 世纪的中国将跃居世界上最显著、最繁荣的诸社会前茅。过去 20 年经济和社会的改革，使中国能够让成百上千万的人摆脱贫困，在最短的时间里让绝大多数人受益，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在新世纪之初，就要真正变成一个城市社会，大多数人民过上城市生活。比较而言，美国用了 60 年——从 1860 到 1920 年——完成了从农村人口占 80% 到城市人口占 50% 的跨越，而中国仅在短短的 20 年中就使城市人口达到 50%。随着整个民族和国家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变得更加繁荣而又不均衡，如此迅猛的转型必然带来巨大的社会压力和紧张状况。

人类学能够而且应当位居前列，帮助中国来面对这些挑战。人类学是个独特的学科，它是惟一一门关注人类各个领域的科学：生物、社会和文化的领域。通过了解我们作为动物、灵长类和人类的需要，人类学寻求了解人类的共性是什么，民族和文化为什么各不相同。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人类学也做出了巨大努力，试图用这种理解来帮助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所以，无论是帮助地方乡政府解决前来谋生的流动人口的问题，还是帮助考古学者和古人类学者更好地了解今天属于中国的这块土地之上的人类丰富遗产，中国人类学者可以继续为祖国做出伟大贡献。

自从 90 年代初本书英文版写成，中国人类学继续发展，当然发展并不平衡。厦门大学的人类学系被撤消了，但其人类学研究所继续从事上乘的研究。云南大学建立了一个独立的人类学系，是从历史系划分出来的。1997 年，香港回归中国，结束了殖民统治的痛苦一章，开放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惟一的人类学系——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进行深入而富有成效之合作的可能性。在北京，北京大学的社会学人类学所和新更名的中央民族大学仍然是领先的人类学研究单位。

笔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德才兼备的学者把本书译成汉文，他们还联系了本书在中国出版的事宜。他们帮助修改了英文版中的一些失实之处，我对此深表谢忱。不过，读者应该注意，这个汉文版通过人类学学科来复述 20 世纪的中国历史，反映的是我这个外国学者的视野和解说。因此，所有失实和误读之处，概由我个人负责。读者也应当理解，本书原来是由一个美国人写给那些可能不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西方人的。本书的目的还在于不仅让他们领会某个学科的历史，而且还要领会中国人民将要赢得的胜利和遇到的挑战，领会他们为了创造一个繁荣、强大、公正和充满活力的国家、迎接 21 世纪的曙光而进行的伟大的社会实验。我们外国人类学朋友向中国人类学和中国人民致以良好祝愿！

Gregory Eliyu Guldin (顾定国)

于美国华盛顿州塔科马，1998 年 11 月 22 日

鸣 谢

1986年前后我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工作，其间曾得到大家的支持与帮助。这对本书的编写至关重要。梁钊韬先生，还有中山大学及其人类学系的其他很多人都为此牺牲了大量宝贵的时间。给过我帮助的其他一些重要院校和机构包括：厦门大学人类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及考古研究所、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广东省民族研究所、广东民族学院、云南民族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昆明动物研究所以及云南大学。来自其他院校的一些个人也对我了解中国人类学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当然，本书中所提出的都是我个人的观点。

本书的草稿完成之后，我还征求过朋友和同事们的意见并得到了他们的指正，在此我要公开地表达我对下述各位的感激之情：陈永龄、Gene Cooper、Chris Cosgrove、Walter Goldschmidt、黄树民、黄淑嫻、Richard Jungkuntz、Steven O. Murray、Jeff Olson 和 Aidan Southall。

在此特别要感谢太平洋路德大学给了我休假年和研究奖金，使我在中国的这部分工作得以完成。我还要表达对温纳－格林（Wenner－Gren）人类学研究基金会和美国学术委员会的谢意，它们支持我出席了一些在中国召开的会议，本书中有些材料就是在这些会议上搜集到的。